

●李明华

大众图书馆哲学初探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philosophy of library is a distillation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library science, and popular philosophy of library is a philosophy easily comprehensible to general librarians. The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library is a place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readers and documents, readers and librarians, readers and readers. It is a social 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a product of human civilisation. Belonging to the social superstructure, it is said to be "The Fourth Social Being".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 are library and its activities. 70 refs.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library. Theories in library science. Definition. Nature. Research object.

CLASS NUMBER G250

建立图书馆哲学,是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6月出版的《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编后”中提出来的,确实应该摆到我们广大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日程上来了^[1]。近些年,专以“图书馆哲学”为题的,有蒋永福^[2,3,4,5]和庄义逊、吕斌、周庆山、郑全太的文章^[6,7,8,9],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张广钦完成了图书馆哲学方面的硕士论文^[10]。笔者写于1995年4月的一篇拙文中提到“图书馆哲学”一词^[11],但未展开。

本文讨论的图书馆哲学着眼于通俗的、大众的、接近实际的,希望是易于被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理解并在实践中有用的“平凡的真理”,而非玄乎的、经院式的哲学。

在我看来,图书馆哲学并非外在的,而是内省的,是在图书馆形成发展过程中、在图书馆活动中、在图书馆人的意识中原本就有的。举凡法律法规、办馆思想、指导方针、发展对

策、经营管理、与社会及读者的关系、对作用的认识与发挥、人—书关系、规章制度、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馆风馆貌、经费控制、建筑与设施的安排、对新技术应用的处置、自动化网络化建设、馆际关系,以及各种论著等等,其中到处可以发现某种哲学思想的存在。笔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和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哲学原本就是智慧之学。正确反映了图书馆运动客观规律的图书馆哲学,应是千百年来图书馆人智慧的结晶,应当还给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可以作为图书馆员的思想武器及认识工具,甚至成为一种精神支柱,并应有助于推动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

1 图书馆是什么

对于图书馆是什么,有多种描述。巴特勒说:“图书馆是将人类记忆传递于现今人们意识中的一个社会装置。”^[12]谢拉说:“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而存在。图书馆是一个组织,是一个保存和便于利用的文字记载系统。它是一种工具,在对任何社会和文化都非常重要的交流网中起着联系的作用。”^[13]“图书馆是一个社会装置,它构成对任何社会和文化有实质意义的交流系统的一环。图书馆正是文化交流系统的一环,是社会交流系统的一种重要力量。”^[14]宓浩说:“现代图书馆是知识传播和交流的中心。”^[15]蒋永福说:“图书馆的实质是人类文化信息的社会化存贮与延传的非生物媒介组织,是人类记忆的共同装置,是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的一环。”^[16]

笔者认为:“图书馆是读者与知识、读者与馆员及读者相互间广泛的交流场。”^[17]

在图书馆建筑设计中,往往强调读者流线、图书流线和馆员流线三者尽量不要交叉,避免相互干扰。这种认识恰恰反映了图书馆的内涵是文献流、读者流及馆员们交汇的场所,是三者相互作用的交流场。

交流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需要。没有交流就不成其为社会,缺乏交流的社会导致封闭和倒退。正是信息交流技术的进步和信息交流规模的扩大,才使得社会文明进步不断加速,才有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教育和文化。人类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要条件及重要因素,而人类积累知识也是要靠传递交流的。知识积累的主要形式或曰主要载体是图书文献。社会信息交流不仅要有交流者和交流物,而且需要一定的交流场。可以说人和书都是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图书馆更是一个供社会公共使用的大型载体,大交流

场。图书馆承载着数千年积累的人类知识,形成社会共有的文化积淀,为社会的人们所共有、共享、共开发,人们从这里吸取他人的智慧,以进行知识的再创造,用以提高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实践。人与文献的交流实质上是知识与智慧的交流与传递。诚然这是一种间接交流,却是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图书馆是整个社会供所有的人与古今中外一切文献所包含着的知识与信息进行最广泛接触的交流场。

图书馆员显然是读者与文献之间的津梁。他不但把世上包含各种知识的文献加以整理,使之便于为读者所利用,而且馆员还为读者答疑解惑,指引文献线索,提供咨询服务,以及组织信息交流和各种读者活动。馆员与读者经常进行着面对面的交流,有时是一对一的,有时则是一名馆员与一群读者之间的。这种交流对于读者来说可以得到馆员的帮助与辅导,便于迅速地或系统地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了馆员作为书海导航员,使人类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更有针对性、更扩大、更有效,能让社会成员更好更多更便捷地加以吸收和利用,这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近代、现代图书馆进一步顺应社会交流的需要,开辟了供读者进行交流的场所,组织、举办或提供条件让社会的人们进行各种交流活动。此类活动可以是报告会、讲演会、座谈会、读者与作家见面、展览会、信息发布会、学术研讨会、小组讨论、文化沙龙或外语沙龙、书评活动,以至于社团活动、社区文娱活动,等等,所进行的交流包括思想交流、知识交流、信息交流、文化交流或学术交流。图书馆这种公共设施成为社会成员、各行各业的人们面对面进行直接交流的理想场所。甚至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理想场所。

综上所述,图书馆是一个广泛的交流场,是可以跨越时空界限,也可以即时进行的交

流场,是各民族间增进相互了解的交流场,是人类智慧不断延续、知识得以扩大再生产的交流场。

2 图书馆姓什名谁

图书馆历来姓“文”,大名就叫图书馆。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它必须面对新的挑战。

图书馆总是以聚集保管社会的知识财富并供人们查阅利用为己任。图书馆为社会担负着文化传播即传播知识的使命。图书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并被认为是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因此,图书馆历来姓“文”,长久以来一直作为文化机构存在于社会。

蔡元培先生说过:“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机关,第一是图书馆。”江泽民同志为上海普陀区图书馆题词:“公共图书馆是人民的终身学校。”这些都阐明了图书馆还肩负着社会教育的职责。社会教育机构当然亦属文化的范畴。

自从社会上有了独立的科学事业和科学研究机构以后,图书馆又成为其组成部分,成为科技资料文献和科技情报的收集、整理与传播者。图书馆的工作成为科学研究活动、科技成果交流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科技情报交流活动在整个社会中也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图书馆又是公众的信息中心。从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看,信息的记录、贮存和传播手段是多样的,除了大脑存贮和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的直接交流外,更多地使用文字、图像、声音等技术手段记录在多种介质上进行间接交流,这就需要有收集、存贮、整理、传递各种信息载体以满足人们查询、索取、阅读、利用需要的社会机构。图书馆就是专门担负此种职责的社会化信息交流工具。当然,人们的信息交流活动仍可归入社会的文化生活中。

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斯泰特认为,图书馆就是使文化的创造和继承成为可能的社会机构^[18]。彭修义在文章中说:“图书馆对社会的知识服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服务,……社会性的知识交流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交流问题。”^[19]

图书馆历来是一种文化机构,它姓“文”,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当社会加速向信息化前进,信息产业蓬勃发展时,图书馆被视为信息服务业或信息产业的一部分,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图书馆似乎就不单纯姓“文”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信息服务业、信息咨询业、信息产业迅速崛起,由于图书馆历来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发生着某种联系,图书馆活动的一部分——参考咨询和情报工作、信息服务就逐渐与企业的经济行动挂起钩来,某些信息产品和服务可以成为一种商品,与市场经济发生关系。这时,很自然地出现了图书馆也属于第三产业、属于信息产业的说法,于是图书馆又兼姓“商”了。在实践中出现了图书馆办信息公司、图书馆与企业联营等做法,和“一馆两业”“一馆两制”。“产业化观念”、“产业化战略”、“参与市场”的说法相当流行,不断被强调^[20,21],甚至说要“建立图书馆市场”。那样,图书馆就不再姓“文”了,而真的要变成姓“商”了。也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提出产业化、市场化不是图书馆的方向^[22],“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不能进入市场,更不能推向市场”^[23]。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可以加工开发信息产品,参与信息咨询业,为市场经济服务,但整体上图书馆属于文化事业的性质不可能改变,图书馆只能是姓“文”。

还有一种说法:图书馆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属于信息服务业,其中又包括两部分,一是以文献信息为社会提供文献借阅服务的传统信息服务,即非经营性文化公益事业;另一是用深加工再生产而形成的信息产

品、信息技术成果为市场服务的经营性信息服务业^[24]。照此说法,图书馆既姓“文”,又兼姓“商”,那么就成为复姓了。看来要改变“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才能讲得通。当然事物总有其主导的方面的质的规定性的,图书馆还是姓“文”。

至于名称,自古以来我国的藏书机构有过许多,从周代“藏室”开始,王宫内府藏书、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观教会藏书、私人藏书,各有名号。很长时间是以“藏书楼”统称。“图书馆”这一名称在中国真正开始使用,可能是清光绪年间(1896年前后)张元济、陈昭常等在北京办的通艺学堂,内设“图书馆”^[25]。清末,罗振玉向朝廷建议,学部于1909年上奏折并开始筹备,于是有了“京师图书馆”。以后“图书馆”这一名称在全国通行,与西方已使用了上千年的机构名称 Bibliothek、Library 相对应。

到了80年代,情况起了变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推行图书情报一体化,更好地或着重地强调图书馆兼有情报职能,于1985年11月改名为“文献情报中心”,同时仍保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名称,不过在对外交往中已不大使用“图书馆”这一名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于1985年10月成立,不叫“图书馆”了。而1995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时保留两个名称,名符其实成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其实,不论中外,图书馆本来就担负着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和传递信息与情报的功能,不但科研机构或大学图书馆是如此,国家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也不同程度地、默默无闻地做着情报工作。所谓情报工作就是从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发展而来的。许多国家没有如苏联、中国这样的“情报研究所”,图书馆都在做我们所说的“情报工作”,并没有因为名称是 Library 而成为问题,也没有听说有多少 Library 改变了名称。可以说,大名叫“图书馆”或“文献情报中心”没有本质上的差

别,其活动规律、工作内容与方法并无多少改变。至于说改了名称之后突出了、加强了“情报职能”,似乎图书馆天然就是“传统式”的、缺乏情报意识的,这是人们的观念与行为问题。在图书馆里,完全可以放手大干情报(信息)研究、预测、交流、服务工作,这些本来就是图书馆的职能,只不过有不少图书馆缺乏进取精神或服务能力。

至于把图书馆改称“文献馆”的建议^[26],恐不会被图书馆界所采纳,虽然在许多科技情报研究所之下有“文献馆”。图书和文献是常可互相置换使用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古代图书或古代文献的介质曾用泥板、纸草纸、羊皮纸、简牍、缣帛,还有刻在石头上的书,其形态是不断变化的。近几十年则出现了电子读物、电子期刊、电子出版物等,也叫电子图书。如今销售唱片、音像带和CD片的商店仍在叫“音乐书店”。1998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CD版)中 Library 第一项释义是:a place in which library, musical, artistic, or reference materials (as books, manuscripts, recording, or films) are kept for use but not for sale^[27],“图书馆是收藏文学、音乐、艺术或参考资料(如书籍、手稿、唱片、录音带或胶片)的地方”。到图书馆查资料可以从纸质书刊查,也可以从音像资料查,可以从缩微品或影片查,也可以从光盘或网上查,到图书馆也可以是参加某项活动而不阅读,读者或用户不会望名却步的。没有听说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纷纷改名,相反,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无墙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网上图书馆等名称却十分流行。当然这些外来名词的译法可能有问题,应译为“……文库”为妥^[27],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仍堂堂正正称为图书馆的。完全不必改名换姓,不存在名不符实的问题。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认为,图书馆最恰当的定义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28],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图书馆是没有必要改为别的名称的。

3 图书馆从哪里来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伴随社会文献信息交流的发展而来。

图书馆在数千年之前就产生了。据考证,公元前 3000 年在古巴比伦及两河流域其他国家,就有大量存放泥板书的专门场所,这也许就是最早的古代原始形态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而考古发现最古老的图书馆是公元前 7 世纪亚述王国的亚述巴尼拔国王图书馆,其藏书已相当丰富,门类齐全,且有专职管理人员和书吏,泥板书按不同主题排列,已有目录。这所图书馆反映了古代奴隶制国家高度发达的文化,对推进当时的学术发展起了很大作用^[29]。中国古代最早的图书形态,是公元前 14~前 11 世纪的殷商甲骨文献,集中收藏甲骨文献的地方,也可认为是最古老的图书馆与档案馆的结合体。而史书有明确记载的是“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隐》按:“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30]。可以说明周朝已有专门的藏书机构和专职图书管理官员了。

图书馆是如何产生的?是信息传播手段与方式的进步及人们产生了贮存管理文献的要求而产生的。

图书馆的产生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条件。古代最原始的图书馆就具备了图书文献、贮藏场所(专门建筑)、管理者、使用者和管理办法这些要素^[31]。早期的图书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已有相当完备的形制^[32]。

在最初出现图书馆的时候,其管理者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学者。作为周代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是连孔子都十分敬仰的。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 290 年建成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其后的 150 年间的 6 任馆长都是哲学家、政治家、语言学家、目录学家,是天文、地理、数学、语法方面的学者、文献学

家或辞典编纂家^[33]。而一般馆员大部分是国家的奴隶或被解放的奴隶。甚至出现了馆长、馆员、副馆员、助理馆员之类的等级^[34]。

最早的图书馆就有其管理制度。图书分门别类加以保管和排列,且有目录^[35]。在其后的许多图书馆都对图书加以分类和编目。图书馆内的分工趋于专业化,管理人员分别从事图书的采购、修补、摘录、排列等工作,有的还从事抄写或翻译^[34]。有的图书馆有几十卷的目录,甚至多达 120 卷纸草卷的名著解题书目,每一作品附有著者生平介绍、书名、总行数及评介^[36]。有的图书馆还公布开放时间,有借阅制度和规则,有允许把书借出去的,而大多数只能在馆内阅览,禁止将书携出馆外^[34]。

从老子为“柱下史”的记载及后人的注疏可以推断,周藏书室已有专门的图书馆建筑,但其具体情形已无从考证。考古发掘足以证明,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的图书馆建在神庙旁边相毗邻的地方,有柱廊相接,正厅内往往安置着神像,周围有著名学者的雕像。馆内藏书室、书库常采用内外双墙结构,以防潮湿,有的把珍贵的书放在优质木料制作的书柜里。有的图书馆甚至是两层建筑,围绕着大庭院,有许多大房间,有书库、阅览厅、会堂和讲演厅。公元前 1 世纪罗马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留下了 10 卷本的《论建筑》,其中谈到私人图书馆的设计,认为图书室应当光线充足,便于阅读,且要防潮,以利于纸草图书的保存^[3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图书馆的出现都是国家统治者的意志的直接结果,这与他们崇尚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当一国建起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后会对周围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其他国家统治者的效仿,竞相建立大规模的豪华图书馆。古代统治者把大量知识的积累看作是巨大的财富,进行统治的资本,因而不遗余力,有的花费大量钱财搜罗购买图书,有的以建设世界第一流的图书

馆为目标。古代国家之间征战频繁,胜利者把战败国的图书作为重要战利品掠夺回国。公元前197~前159年统治拍加马王国的欧墨涅斯二世为想使自己的图书馆超过亚历山大图书馆,曾计划劫夺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阿里斯托芬,可见这位图书馆馆长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38]。

图书馆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一开始就是与国家的统治密切关联的。图书馆的诞生,不但是文化发达的标志,而且是国家强盛和统治稳定的结果。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制度进步、社会出现高度的分工、知识与文献大量积累的结果。创设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行为;作为一种社会机构,是统治者意志的产物。它是国王的财富和统治者的智慧宝库,国家的学术中心,也成为读者吸取知识的场所,甚至可以说是公民共同的财富。图书馆是物质与精神结合的美丽果实。

4 图书馆的属性是什么

图书馆历来被认为属于上层建筑,也有人说它是生产力,或者说是“第四类社会存在”。

关于图书馆的属性,历来认为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依据它是一种文化机构,而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且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把图书馆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即使在80年代的教材里仍肯定“在阶级社会中,图书馆具有一定的阶级性”^[39],是“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40],那么,图书馆理所当然地归入上层建筑了。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了“文化问题”,他着重分析的是“观念形态”上的文化^[41]。而图书馆恰恰并非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是属于社会的信息交流与知识传递的文化组织,是不应与观念形态划等号而简单地归入上层建筑的。

最早出现不同观点是在思想上、理论上开始拨乱反正的1979年,提出“科学图书馆是生产力”的新论点^[42],1980年程亚男在文章中说:“图书馆作为一种生产力在四化建设中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社会作用”^[43],于鸿儒则认为“图书馆活动是一种特殊生产”^[44],何善祥在论文中说:“不能把图书馆事业看成和政治、法律一样的上层建筑,它有属于社会生产力因素的一方面”^[45],陈云龙提出“现代图书馆基本上属于知识形态生产力”^[46]。而在1980~1981年同样以“图书馆是上层建筑吗?”为题的论文就有陈辅德、李克西与茅振芳、邹本栋的3篇^[47,48,49]。

黄宗忠的观点是:“图书馆既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又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既有上层建筑的属性又有经济基础的属性”,“是二者兼有的综合体”^[50]。

看来,图书馆有上层建筑的一面,也有属于生产力的一面,但很难归于哪一方面。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按“非此即彼”的逻辑明确其属于什么的。研究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大多已认为图书馆是属于社会的交流系统。周文骏指出“图书馆本身就是情报交流工具,并且是文献这个交流工具的存贮者,组织者和利用者”,“图书馆工作属于人类社会通讯活动”,“图书馆情报机构……本身的存在就是交流中介”^[51]。有的认为“图书馆活动的实质是文献信息交流”^[52],“中介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53]。而金恩辉则认为:“不应当以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孤立地、片面地或者表面地看待图书馆的性质问题”^[54]。宓浩认为:“就本质来说,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的工具,是社会知识活动中的一个环节”^[55]。笔者1984年编写的讲义中是这样阐述的:“图书馆是专门贮藏与传递文献的社会化信息机构”,“它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它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密切的联系,而又不能完全归属于这三大领域的任何一个

的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社会要素,是极其复杂、无限多样的。社会和人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两类必要的社会要素。语言、教育,还有图书馆,是社会和人用以交往和交流信息的,也是人类社会要素”^[56]。很明显,既然图书馆“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是社会的记忆器官,是人类超越时空的交流场,是所有人类智慧、人类文明、人类精神财富的承载物和传递者,社会赋予它的使命是保存和传递所有历史上的和当代最新的知识成果和信息,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各方面的,它可以而且应当被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来利用。所以说它是属于社会有机体中的一种要素,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入上层建筑或生产力,或说它是兼有两种属性的综合体。不妨说图书馆属于“第四类社会存在”。不久前出版的《第三种科学》也许可以给我们新的启发^[57]。

5 图书馆能成为研究对象吗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是图书馆活动。图书馆学这一学科名称本身没有错。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吗?把图书馆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否科学?以一种机构名称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是否大错特错?这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图书馆学是人们在图书馆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加以系统化的产物,是对图书馆活动经验进行的总结、概括和提炼而得到的系统的、科学的认识。图书馆学离不开图书馆的实践。随着社会的前进,人们对图书馆的要求不断扩大和提高,社会赋予图书馆的任务越来越多,图书馆也越办越多,图书馆活动不断发展和开拓,变得越来越丰富。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也跟着不断扩大和深化,图书馆学也就不断开拓和发展,这一切是合乎规律的进展。离开图书馆活动,离开实践的发展,离

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来探究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事件,显然难以得出恰当的、合乎规律的认识。图书馆活动的实践性特别强,人们对图书馆活动的认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必然是与此密切相联的,图书馆学必定是一门实践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图书馆学不是空中楼阁。

近代图书馆学,或古典图书馆学与近代图书馆学为什么产生于欧洲,发达于美国?道理很明显。欧洲在17世纪至18世纪已经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图书馆事业,其图书馆实践已达到相当的程度,必然要求有人加以系统地总结。顺应时代的要求,1627年发表《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的法国人诺德,成为图书馆学的开拓者,他从事图书馆管理,并向英国和意大利的图书馆学习,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本图书馆学理论书是欧洲多少个世纪以来图书馆经验的总结。而另一位近代图书馆理论方面的创始人、大科学家莱布尼茨则从27岁起就在图书馆任职,前后共达40年。

1867年提出“图书馆学”,次年出版《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的施莱廷格,从事图书馆工作长达45年。我们应当永远对这位图书馆学的开山鼻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正是由于他的发明,把图书馆和科学两个词联结在一起,创造了Bibliothek Wissenschaft这个名称,成为一面大旗,把千千万万图书馆工作者带进“科学”这座崇高宏伟的殿堂。正是因为有了他这种开拓性的努力,他把对图书馆的知识加以系统的总结和概括,才有后继者们集合在同一面旗帜下,一代又一代继续前进,不断发扬光大。不论中国博学多才的学者新近发现“图书馆学”这样一个学科名称是多么不规范、不科学^[58],发现了这个学科名称多么失当^[59,60],或“图书馆学一词的创造实属悲剧”^[61],也不论是不是该诅咒当初发明这个新词^[62],不管是否发现“图书馆学理所当然被否定”及“这一名称渐渐被人们抛

弃”^[62], 在实际上, 图书馆学却早已被外国和中国的科学界所承认, 而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且并没有见到将被逐出科学园地的迹象。世界上许多人由于学习和研究图书馆学而获得了硕士、博士的学位和教授的头衔。

图书馆是否可以作为一门学问的研究对象? 反问一下: 世上有图书馆这样一种社会存在, 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 为什么就不能或不应当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呢? 人们对图书馆活动的认识加以系统化之后, 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图书馆学呢? 施莱廷格当初把他编的教材叫“图书馆学教科书”, 大概无意让后人都跟着他开辟一门新的“图书馆学”学问, 但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菲律宾人、中国人等等都跟着研究起图书馆学来, 开办起图书馆学校来, 创办起图书馆学术团体来, 出版起图书馆学刊物来, 这能怪 200 年前这位德国人造词不当吗? 施莱廷格在 1834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总览》中写道: “图书馆学是适应于图书馆目的措施, 是在切合实际的原则上有系统地制定出的必要的定理, 同时是把这种原理导向最高原则的全部学问。”他何曾限制过后人的思维呢?

正是在“图书馆学”这面旗帜下, 巴特勒在 1931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图书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 “图书馆是为把它移入活着的个人的意识的一种社会机构”。这部书的第二章是“社会问题”, 对于图书馆与社会、对于知识、对读书行为作了多方面的阐述。他说知识的收集和传递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员的基本使命。他把读书现象与作为其工具的图书, 以及通过图书传递知识, 看作图书馆学应当科学地阐明的固有专门领域。他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 这里哪有“图书馆学”这一名称限制他创造性开拓的影子呢?

另一位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提出“社会认识论”, 发表了《图书馆哲学》。他在《图书馆学引论》^[63]第 2 章“图书馆与社会”中讲文

化, 讲交流, 讲社会权力, 后面又讲图书馆自动化、情报检索, 还讲“图书馆与信息网络”。他在图书馆学这面旗帜下不受限制地纵横驰骋, 甚至坚持认为情报学只是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

中国几代图书馆学家从本世纪 20 年代至 90 年代, 在“图书馆学”的大旗下出版了许多有份量的理论著作, 发表了大量有创见的理论文章, 取及了堪称丰硕的理论成果, 而且正在群策群力, 探索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图书馆学道路从未因为这一名称而停止不前。

其实, 认为图书馆或图书馆活动、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也不在少数。如黄宗忠、吴慰慈、金恩辉、朱建亮等^[64]。吴慰慈、邵巍说: “图书馆学如果不研究图书馆事业, 那就不是图书馆学了”^[65]。笔者 1984 年参加“杭州会议”的论文中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图书馆’, 确切地说, 是图书馆活动”^[66]。金恩辉说: “‘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作’、‘图书馆活动’, 都是包含在‘图书馆’这个总的、一般性的概念的逻辑含义之中的; ‘知识交流’或‘情报交流’, 也仍然是对图书馆本质和机能的揭示; ……图书馆学不研究图书馆, 它也就不成其为图书馆学了”^[67]。

“图书馆”可以说是一种机构名称, 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社会实体。当然可以把图书馆理解为一座座的建筑物, 供人们阅读研究的地方, 而本质上它是一种社会现象, 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矛盾运动。当“图书馆”与“学”字相联结为一个词而成为学科名称时, 这里的“图书馆”三个字就赋与了跟原来不同的含义, 就抽象为最一般意义上的图书馆, 成为科学对象的概念, 而不是具体的图书馆, 成为“白马非马”中后面的那个“马”了。

把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 显然是对图书馆这种与千千万万人、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复杂事物作为对象来加以研究, 包括其元素, 其有机体, 其活动, 其矛

盾,其规律,其运动状态,其与社会和读者的关系,其个体与群体,其内部关系,其技术手段、工作方法、经营管理,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过去与未来的发展变化……,作全面的、深入的、历史的、辩证的、立体的、综合的、动态的、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科学研究,绝不会把自己封闭在“馆”内。我们从来也没有“画地为牢”。许许多多前辈及当代的研究和图书馆工作者不是都在孜孜不倦地从各方面探求、推进、拓展、丰富、完善着这门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吗?

认为多年来对研究对象长期的喋喋不休的争论,是由于学科以机构名称命名的模糊性而导致的^[68],非也。提出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交流说,以及各种新说,争论的实质是研究者们企图更深刻地分析和揭示图书馆学的内核。这些学术争论是人们对研究对象认识深化的过程,论争恰恰是符合科学演进发展规律的,是有利于学科发展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并不是由于学科名称而引起的。

周文骏为《当代图书馆学百家文选》所作的“序”提出,图书馆学要加强研究图书馆作用、“图书馆技术”、“图书馆智慧”、“图书馆资源”。他说:“信息时代”正引导着图书馆学发展进入“图书馆科学技术”的新时期^[69]。他又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似乎很早就有哲学观点和方法相结合的趋势,这可能与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有关。”^[70]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以及图书馆的实践活动,都为图书馆哲学的研究提供着异常丰富的养料,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必定能取得好的成果。

时代呼唤图书馆哲学。

参考文献

- 1 周文骏.建立图书馆哲学.见:周文骏,倪波主编.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366~367
- 2 蒋永福.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黑龙江图书馆,1990(1):21~24
- 3 蒋永福.图书馆学的三个研究范畴——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二.黑龙江图书馆,1990(6):20~23
- 4 蒋永福.图书馆学也是一种人学——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三.黑龙江图书馆,1991(6):7~10,41
- 5,16,62 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散思.图书情报工作,1998(9):13~17
- 6 庄义逊.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研究组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集,杭州,1985:85~100
- 7 吕斌,李国秋.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与情报,1997(1):6~16
- 8 周庆山.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情报工作,1997(11):6~8,23
- 9 郑全太,孙淑文.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图书情报工作,1998(9):18~20
- 10 张广钦.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看图书馆哲学的内涵.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8.6
- 11,17 李明华.走向辉煌而不是消亡——对图书馆未来的探讨.中国图书馆学报,1996,22(1)
- 12 P.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见:袁咏秋,李家乔主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48
- 13 J.谢拉.图书馆学基本原理.见:同上:300,302
- 14 J.谢拉著;卿家康,詹新文译.图书馆哲学.大学图书馆通讯,1987(4):49~53
- 15,55 宓浩.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47
- 18,40,53,65 吴慰慈,邵巍编著.图书馆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41
- 19 彭修义.对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理论的知识文化考察(二).黑龙江图书馆,1987(4):17
- 20 刘经宇.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见:杜克主编.中国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12~15
- 21 贺定安.图书馆变革的出路在于形成知识信息产业.中国图书馆学报,1995,21(5):22~24
- 22 何善祥.产业化市场化不是图书馆改革的必由之路.图书与情报,1997(4):1~7,15
- 23 王学熙.对“市场经济与图书馆”研究中几个争议问题的剖析.中国图书馆学报,1995,21(5):53~55,63
- 24 欧阳初.浅议图书馆信息产业面临的问题与对

- 策.图书馆论丛,1997(4):15
- 25 汪家熔.两件图书馆史史料.图书馆学通讯,1983(2):88
- 26 刘炳宗.“图书馆”改名为“文献馆刍议”.新疆教育学院学报(汉文综合版),1997(4):87~89
- 27 陈光祚,匡光波.关于 Electronic Library 等名词译名的商榷.图书馆杂志,1998(5):13~15,51
- 28 徐引箴,霍国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24(3):8
- 29,31,33~38 杨威理.西方图书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8
- 30 老子韩非列传.史记.卷六十三.见: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96:1
- 32 P. Briscoe 著;孙泽华译.亚述巴尼拔的永恒模式.大学图书馆通讯,1988(2):54
- 39 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图书馆学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1
- 41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4~709
- 42 李明华.科学图书馆一生产力.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11~12
- 43 程亚男.试论图书馆与生产力.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20 见:贵图学刊,1980(2):2
- 44 于鸿儒.图书馆活动是一种特殊生产.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22~23 见:四川图书馆学报,1981(1)
- 45 何善祥.图书馆与生产力.高校图书馆工作,1980(3):15
- 46 陈云龙.现代图书馆基本上属于知识形态生产力.图书工作通讯,1980(22/23):7
- 47 陈辅德.图书馆是上层建筑吗?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50~51
- 48 李克西,茅振芳.图书馆是上层建筑吗?四川图书馆学报,1980(3):82
- 49 邹本栋.图书馆是上层建筑吗?黑龙江图书馆增刊1980年年会论文集 *
- 50 黄宗忠编著.图书馆学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40
- 51 周文骏.概论图书馆学.见: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研究组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集.杭州,1985:150,144,149
- 52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编.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151
- 54 金恩晖主编.图书馆学引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28
- 56 李明华.信息交流与图书情报.见: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等联合编辑.图书馆学论丛——李明华论文选.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1988:109 或见:信息交流与现代图书馆系统.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32
- 57,67 孙万鹏.第三种科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 58 霍国庆.面向未来的图书馆学——网络时代的认识与思考.我们的未来——'98全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98:10
- 59 侯金川.图书馆学情报学向何处去?——新技术条件下的学科定位问题.图书馆,1998(3):14~15
- 60 霍国庆等.西方图书馆学派评(一).图书情报工作,1998(4):4
- 61,68 霍国庆.图书馆学、文献信息学、信息管理.山西图书馆学报,1993(4):1~3
- 63 J. 谢拉著,张沙丽译.图书馆学引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
- 64 朱建亮.论图书馆学和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对象.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20(1):52
- 66 李明华.图书馆学的对象、内容和性质.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4(4):6
- 69 周文骏.迎接图书馆学发展的新时期.图书馆,1998(1):1~2,26
- 70 周文骏.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北京大学学报(信息管理系专刊),1997:15
- 李明华** 杭州图书馆研究馆员.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编 310006.
- (来稿时间:1998-11-09.编发者:李万健)